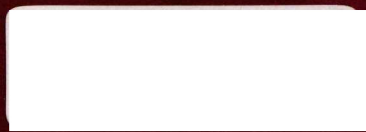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世界幼教名人名著

陶行知幼儿教育名篇选读

陶行知著 李其永 李其龙 李其龙 编



世界幼教
名人名著

陶行知幼儿教育名篇选读

喻琴 喻本伐 选编/校注/点评

出品人 李 兵
策 划 周祥雄 金锦秀 罗 萍
整体设计 刘嘉鹏
责任编辑 蒋邓崆 刘文丽 刘嘉鹏
美术编辑 徐 晟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陶行知幼儿教育名篇选读 / 喻琴, 喻本伐选编、校注、
点评.

-- 武汉: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11

(世界幼教名人名著)

ISBN 978-7-5560-0474-4

I . ①陶… II . ①喻… ②喻…

III . ①幼儿教育-教育理论 IV . ① G61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49909 号

出版发行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印 刷 深圳市森广源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,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00×1000 1/16
印 张 19.5
定 价 10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向承印厂调换

《世界幼教名人名著》编委会

中国部分

主编 喻本伐
编委 田正平 唐 淑 冯晓霞 金林祥
熊贤君 蔡迎旗 田景正 朱宗顺
赵 燕 喻 琴 胡 琼 徐恩秀

外国部分

主编 杨汉麟
编委 吴式颖 杨汝模 单中惠 肖 朗
李申申 周 采 方 桐 易红郡
屠大华 周红安 许建美 杨 佳
方 红 钟佑洁 李 伟

出版说明

幼儿教育作为教育学科的重要领域之一,具有悠久的历史,中外历史上的硕彦鸿儒、有识之士,在此方面有过许多论述,留下不少金玉良言。它们成为人类历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,具有永恒的不朽价值。当代人阅读这些书籍、篇章,仍可从中汲取许多有益的教诲,同时对于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大有裨益。

对于幼儿教育工作者及相关人士来说,更是如此。一部全面、尽可能包罗古今中外所有幼儿教育名家(包括名著、名篇)的丛书,既能拓宽理论视野,又能为自己的学习和实践提供丰富的资料储备、理论指导乃至历史借鉴,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、服务家庭、养育后代,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,不遑多论。

幼儿教育,几乎与人类自身的历史一样悠久,而社会化的公共幼儿教育的诞生,则至今不过两百多年。但既经脱颖而出,随着时代的发展,幼儿教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幼儿教师、教育行政工作者、对教

育子女有强烈愿望的家长的关注。特别是在当代中国,学前教育正在迎来一个史无前例大发展的新时期。更多的幼教工作者、幼儿教师以及相关人士,对于凝聚人类智慧的历代幼儿教育理论,有深入解的需要。

浏览国内幼教读物的新书架,尽管种类繁多,但略显杂乱。有关出版物良莠不齐,远非系统、完备;加之名人名著特殊的写作背景、时代背景,以及有时过于专业、精伪掺杂的内容,有可能阻碍普通人群进一步阅读的兴趣,甚至会使人陷入迷茫,不知如何去伪存真、去粗取精,汲取历史的精华,从而为我所用。对于这部分人群(可谓广大人群)来说,一部经过专家精心遴选,兼以详加评注的读本,可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名著名篇,汲取历史精华。显然,这样一套丛书的问世,既有利于深研幼教理论,又有利于优化幼教实践。其实用价值及社会需要显而易见。

基于以上考虑,我社从2012年年初,便开始筹备本丛书(即世界幼教名人名著系列)的出版事宜,并诚邀国内有关领域学养深厚者共襄盛举。经过两年多的筹备,我们对遴选书目及编辑体例达成共识,并紧锣密鼓地完成了部分书籍的编译、评注等工作。本丛书第一辑,定于2014年年末面世。我们计划,只要条件许可、市场欢迎,我们将继续推出第二辑、第三辑……力争经过若干年的努力,为社会奉献一套比较全面,尽可能包括古今中外所有幼教名家相关著述的丛书,从而为我国幼儿教育的发展奉献绵薄之力。

丛书的读者对象,定位于一般的幼教工作者、行政管理工作者、家庭教育工作者、学前专业及师范院校学生、渴望得到科学育儿指导的父母,以及一切对中外历代幼儿教育思想有研究兴趣者。

丛书分为中国和外国两大部分,再分别为专著系列和选编系列。在专著系列中,整本编译幼教名家的代表性著作;在选编系列中,则按时段或国别,选编知名人物的幼教论述(包括文论节选、单篇文章及著作节选)。

丛书以忠实于原著为第一原则，编译者以妄加删改为忌。为帮助读者理解，编译者将在每位“幼教名人”的“名著”之前，撰写“导读”或“生平及其学说”，同时在书后附“作者生平著作大事年表”；为便于阅读，编译者既提供题解或其他解析文字，又对相关人物、制度、器物、术语等进行脚注；为丰富思考，编译者对相关背景、不同主张、价值判断或意义发掘等，进行点评；为活跃版面，外国部分的编译者，还搜集、编排了若干插图，力求图文并茂。

外国部分，除采用国内已有的公认较好的译本外，我们还根据专家的意见，组织新译了一些名著；在中国部分，我们也将开拓一些新的选题，挖掘历代幼教思想的精华。

由于中外历史背景的差异，以及“双主编制”的分工不同，所以中国部分和外国部分的编写体例稍有不同。因此，这两部分各自制定了编写体例。

最后尚须重申的是：毋庸置疑，本丛书所收选的书藉、篇章既闪耀着人类教育智慧的光辉，又由于作者所处时代、认识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当之处，因此读者在阅读时一定要以正确的理论作指导，对书中的内容进行分析，而不可照搬照抄；书中专家的导读及点评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些帮助，但也不可视为定论，学有余力的读者完全可对本书进行更加广泛、更加深入的研究。

我们虽然作了很大努力，但鉴于有关工作的复杂性及编译人员的水平，本丛书难免会有不当之处，欢迎读者批评指正，以便我们不断改进工作，使本丛书日臻完善。

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2014年9月

中国部分凡例

一、本书专著系列,以依选定本“全录”为原则,包括原注、作者自制表格、自选插图等,均不作改动,力求“保留原貌”。但是,对于转引他人的大块文字或冗繁图表,若因篇幅所限,则可在作出说明的前提下予以适当删削。

二、本书选编系列,则以节选为原则。节选部分,也以“保留原貌”为准则;对于原注、作者自制表格、自选插图等,均依原样照录。文章编排,可分为两种情况:一为单一教育家成卷者,依写作或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;二为两位以上教育家成卷者,首先依教育家的生年排序,再依某位教育家作品的写作或发表时间排序。

三、本书的文字处理,以忠实于原著、保留各时段文字语言的历史风貌为原则。除繁体字、异体字、通假字依照国家的相关规定进行统一处理外,余皆不作改动。对于原著中明显的错别字、衍字或脱字,编者在该字或该处之后置“〔 〕”,并将订正或补加之字置于六角括

号之内；对于原文已无法辨识的文字，由编者用“□”号表示。

四、本书对标点符号的处理，分为两种情况：（1）凡原著有标点者，原则上尊重作者的断句；但是，编者可对当断未断或断句不当处进行补正。（2）凡中国古代文献中未标点或断句不当者，均由编者统一断句和标点。标点符号的采用，依照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13日发布、1996年6月1日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·标点符号用法》。

五、本书的数字处理，依照国家的相关规定，分为两种情况：（1）1840年以前，均保留中文数字的相关表述。（2）1840年以后，除统计表格中的数据、四位数以上的数据，以及百分数（%）用阿拉伯数字表述外，余皆保留原作者的相关表述。

六、本书的篇章序号处理，也依照两段分别处理：（1）1840年以前，均保留文论的篇章原貌，或依照古籍整理专家的分章排序照录。（2）1840年以后，章、节均以中文数字标识；其下依一、（一）、1、（1）、①标号。凡原著中的甲、乙、丙、丁……，a、b、c、d……等标号，编者皆不取。

七、本书的文字分段，古代部分，由编者参照古籍整理的现有成果，再依据文意，进行审慎的分段或再分段处理。近现代部分，原则上依据作者的原有段落录排；若一段中的文字过长或作者原来的分段不当者，则由编者进行分段处理，并无须交代。对于大段引文，编者进行另起、专段并改变字体的处理。

八、本书注释，采用脚注形式，每页均重新序号。注释对象，为人物、事件、专用术语、特殊名词、非通译人名或术语、疑难生字词、外文等。同一注释对象，在同一卷中仅详注一次，且以首次出现时加注为原则。其后若再出现时，可注释“参见×页”，以便利读者。对于原作者注，将在注释中特别说明，并用引号标明其内容。若为标列文论出处的注释，凡中国作者，均无须标列国籍；但对于民国以前的作者，须用“〔 〕”标明作者所属朝代。凡外国作者，均以“〔 〕”标明国籍。

一般只列简称,如[美]、[苏]、[英]等。特殊需以多字标示者,为[瑞士]与[瑞典]、[埃及]与[埃塞俄比亚]、[古希腊]与[希腊]等,用以区别可能混淆的国别。

九、本书的译名处理,无论人名、物名、事名,均以保留文论中的原名为原则。现今通译名,则以注释方式呈现。由于注释取“首注”原则,故其后的非通译人名,尽可能地采用“参见”形式再注。即使在同一书中作者前后所使用的译名不同,编者也不作求同式改动,仅在注释中作出说明。

十、本书版式,在每页右侧均“留白”四分之一。其用途有三:一为便于读者阅读时“侧批”或“备忘”;二为编者对重点、难点问题在对应位置作出“解析”(主要针对古籍);三为编者对某些观点的价值或偏颇在对应位置作出“点评”。

十一、本书各卷,均由编者在书前撰写“导读”(定名《×××的生平及其教育学说》),置于书首;而书后,则附《×××生平著作大事年表》。前者并非严格依照时序,重在对相关理论的介绍和解析;后者则严格依照时序,重在対生平大事及其著述的载录。

陶行知的生平及教育学说

喻本伐

陶行知(1891~1946),原名文濬,改名知行,定名行知。安徽歙县人。他是中国近现代享有世界声誉的教育家。他所创立的“生活教育”理论,致力扫清“土八股”和“洋八股”的双重影响,为构建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作出了有益的尝试。若就其对教育理论的贡献而言,可称之为“创造的教育家”;若就其对教育实践的贡献而言,可称之为“开辟的教育家”。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,他对中国幼教事业的近代化,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一、家世及求学经历(1891~1917)

(一)家道中落

陶行知的父亲,名长生,字位朝,号筱山(笑山),早年入读私塾和经馆,知书达理。陶父以经营祖传“亨达官酱园”为业,且家有田产四亩,在当地可谓为殷实之家。陶行知的母亲,名曹翠仂,为休宁县万

安镇人。她相夫教子，毕生勤劳。陶行知有一姐一妹。姐宝珠早夭，妹文漾也病逝于中年。

自陶行知出生后，家道便开始中落。这一方面缘于社会的动荡和腐败；更为主要的，则是陶父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。此后，家中的积财耗尽，酱园铺又盘让给了他人，于是只能依靠祖传薄田维生。问题是，陶父不会农活，且身体每况愈下，生活重担主要由陶母承担。据称，七八岁后，陶行知便帮助母亲做些农活；有时，也跟随父亲从事一些贩卖活动。

1934年陶母去世后，陶行知面对母亲所遗的一把剃刀，曾颇有感慨地写道：

吾母治家，最为勤俭，连剃头都是她一人包办。这把剃刀，成了我们最可纪念的传家宝了。它剃过我父亲的头，剃过我的头，剃过桃红、小桃、三桃、蜜桃的胎头。

为此，他作诗一首：“这把刀，曾剃三代头。细数省下钱，换得两担油。”^①上述“桃红、小桃、三桃、蜜桃”，为陶行知四个儿子的小名。这把剃刀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陶行知当年的家道。

（二）破蒙于私塾

6岁前，陶行知便随父识字若干。6岁后，他便入塾破蒙。塾师方庶咸，秀才出身，设馆于旻村；他课蒙有方，乡誉甚隆。入塾后未久，陶行知便显露出记忆力强、领悟力高等早慧特征，因而深得方先生喜爱。

两年后，寄居于万安的外祖父母家，就读于左近的吴尔宽蒙馆。吴先生也为秀才，经学造诣较深，通过“对读”等方式，使陶行知接受了为学方法的基本训练。师从吴先生的时间，大体为3年。

11岁后，因家境日益败落，加之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，故只能辍

^①《吾母所遗剃刀》，华中师院教科所编：《陶行知全集》第4卷，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216页。

学归家,帮助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,过早地开始分担家累。不过,陶行知好学的本性并未泯灭;他不仅勤奋自学,而且通过“问学”来解决疑难。据称,他常到歙县上路街秀才程朗斋处问学“四书”,又私淑贡生王藻,向其求教“五经”中的疑惑。

(三)入读“崇一学堂”

陶行知 15 岁时,终于迎来了改变人生命运的契机,进入歙县崇一学堂接受新式教育。该校为教会学校,当时附设于基督教教堂之中,由英国传教士唐进贤兼任校长。该校初办时,系小学性质;此时,已升格为中学,学程 3 年。即使该校免收学杂等费,但由于国人当时的排外情绪浓烈,所以愿意入学者并非很多。

说起陶行知的入读该校,纯属偶然。陶父约于 1905 年前后受洗信奉了基督教。此后,便介绍陶母到教堂帮佣。因此,陶行知便开始经常进出耶稣堂。1906 年春,唐进贤发现这个少年好学若渴、谦恭有礼,于是特允插班,将陶行知纳入帐下,引领他进入到另一片知识的天地。

考察陶行知在该校所修的课程,属“旧学”者,有德行、修身、经学、中国历史;属“新学”者,有英文、算学、代数、格致、西方历史、地理、音乐、体操。陶行知尤重外语。他学习认真、刻苦,成绩优异;课余既关心西方的政事、宗教、风土人情,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饶有興味,尤其喜爱唐诗,从而为成为“大众诗人”扎下了根基。1908 年春,陶行知用两年时间修完了三年课程,顺利地崇一学堂毕业。

(四)肄业于“金陵大学”

1908 年春,陶行知毕业于崇一学堂后,前往杭州投考“广济医学堂”,立下了“医药救国”的志向。然而考中入读后未久,便“愤而退学”,流落苏州。后得恩师唐进贤之助,于 1909 年入读南京“汇文书院”文科。

1910 年 2 月,汇文书院与南京“宏育书院”合并,改办为“金陵大

学”。1911年春，陶行知以优异成绩从预科升入本科。汇文书院和金陵大学均为美国教会学校。同年4月，金陵大学获美国纽约州教育局暨纽约大学认可，承认其为“完全大学校”，并可由纽约大学校董会签发毕业文凭，从而可直接申请进入美国各大学研究生院。因此，更是增添了陶行知为学的动力。

在金陵大学求学期间，陶行知除继续努力于英文和西学课外，又“开始研究王学”，从而信奉王守仁的“知行并进”学说，并以“知行”为笔名，在校刊《金陵光》上发表文论。课余，他还担任《金陵光》中文报的主笔，参加各种社团活动，并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浓厚兴趣。此外，他的宗教情结也日益浓烈。他曾自称：“我于1913年成为一个基督徒。”^①因此，金陵大学校长包文对陶行知也格外看重。1914年6月，他提交毕业论文《共和精义》，随即获准毕业，获美国纽约大学承认的金陵大学文科学士学位。

（五）自费留学美国

1914年8月，陶行知自费赴美留学。启程之前，遵父母之命，回歙县与汪纯宜女士完婚；又为筹足留学经费而四处奔波。幸好，主要经费由教会承担；否则，依陶行知家境，是无法负担并难以成行的。

启程日期是，是年的8月15日。同船乘“中国号”赴美留学者，共百余名。其中，由清华学校派出者，便有70余名，陈鹤琴即是其中之一。陶行知与陈鹤琴的结交，便是始于此行。9月7日，船抵旧金山。中国留学生由此分赴各自所选定的大学。

陶行知先入伊利诺伊州立大学，攻读“政治学市政专业”。该校此前已有竺可桢、穆藕初等数十名中国留学生由此毕业。陶行知入学后，依旧勤奋、刻苦，遂于1915年6月，提前修完规定学分，获“政治学文科硕士”学位。在校期间，由于受考夫曼教授影响，陶行知的

^①《我的简历及志向——致罗素》，华中师院教科所编：《陶行知全集》第8卷，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728页。

志趣,逐渐转移于教育。

1915年9月,陶行知入读哥伦比亚大学,旨在获得该校“师范学院文凭和更高级学位”。在哥伦比亚大学,他系统修习了教育学博士课程,与任课教师罗格、特威克斯伯里、斯特雷耶等过从甚密,又经常向杜威、孟禄、克伯屈等教育名家请教,还经常到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小学见习,从而奠定了较为深厚的教育理论基础,并锻炼了教育实践的能力。

1917年8月,他已修完申请博士学位所需的学分,只因博士论文选题《中国教育哲学与新教育》需归国搜集相关材料,因而被特许推迟提交论文并补行答辩。归国后,因种种原因,陶行知终究未能提交这篇博士论文,因而也未能获得博士学位。至于时人所谓“陶行知博士”的称谓,系指1929年12月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陶行知的“荣誉理学博士”学位。陶行知归国时,仅获哥伦比亚大学师范院出具的“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”。

二、任教南京高师并投身“新教育运动”(1917~1927)

(一)南京高师的任职经历

1917年9月归国后,陶行知应聘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任教师,主讲教育学、实用教育统计学、教育行政问题、都市教育行政、师范学校组织及行政、学务表册等课程。他备课认真,教学深入浅出,深受学生欢迎。

课余,他则致力于教育学术研究,发表了《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》、《教育研究法》、《试验主义与新教育》、《试验教育的实施》等一系列论文,大力倡行试验主义新教育;又参加中华职业教育社、新教育共进社、江苏省教育会、实际教育调查社等新兴教育社团,热情投身于新教育运动。

1918年3月,陶行知代理南京高师教务主任。此后,他所主持办

理的主要事项有：(1)筹组“教育专修科”，旨在培养中等师范教育学和心理学师资；(2)支持南京高师学生成立“教育研究会”，被特邀为该会“指导员”；(3)接受江苏省教育厅委托，代办“县视学讲习会”；(4)主持改“教授法”为“教学法”，要求“教法”必须依据“学法”；(5)列名参与邀请杜威来华讲学，并参与接待和翻译工作；(6)支持南京高师学生参与“五四”运动，担任“南京学生联合会”顾问。

1919年10月，陶行知正式出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。此后，他所主持办理的主要事项有：(1)在校务会议上提出《实行选科制案》，以“学分制”调动学生的求学积极性；(2)参与发起成立“南京学术讲演会”，担任该会的“临时主席”；(3)与北京大学相约同时招收女生，实现国立高校的男女同学；(4)举办了南京高师“暑假学校”，集中培训中小学教师；(5)以南京高师教育科名义创设了“昆明学校”，为失学平民子弟提供受教育机会；(6)陪同孟禄进行中国教育调查，参与修订《壬戌学制》；(7)参与将南京高师升格改办为“东南大学”，完成“东南最高学府”的组建。

1923年7月3日，撤南京高师校牌，东南大学正式设立。陶行知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、教育科主任、教育系主任和校行政委员会委员。然而，由于所兼中华教育改进社“主任干事”的事务日益繁忙，北京、南京两地实在难以兼顾，于是他仅接受“教授名义”，婉辞了其他三项聘任。8月底，请辞获准。此后，他便专注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社务。

(二)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“主任干事”

中华教育改进社是推进“新教育运动”的中坚，它由“新教育共进社”、“实际教育调查社”和“《新教育》杂志社”合组，成立于1921年12月。陶行知原任《新教育》“主干”；次年2月，受聘兼任该社“主任干事”；1923年8月，辞东南大学职，专任主任干事职。至1927年3月，陶行知任是职5年，主要开展了如下数项活动。

其一，主持召开了四届年会。1922年7月3~8日，在山东济南举

行第一届年会,主要研讨了“新学制”的修订问题;1923年8月20~26日,在北京清华学校举行第二届年会,主要研讨了“平民教育”的推进问题;1924年7月3~9日,在南京东南大学举行第三届年会,主要研讨了“收回教育权”问题;1925年8月17~23日,在山西太原举行第四届年会,主要研讨了“普及义务教育”问题。

其二,协助开展智力测验。1922年5月,陶行知邀请美国教育测验专家麦柯尔(W. A. Mccall)来华,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“特约研究员”,协助进行“智慧测验”;国内则邀请陆志韦、陈鹤琴、廖世承、刘廷芳、徐则陵等人,全力配合麦柯尔工作。除进行分省区的调查和试验外,还在东南大学开办“测验之编造与应用进修班”,又在北京高师举办“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”。此外,还结合中国儿童的智力发展特点,修订编制了50余种测验方案;并以“中华教育改进社丛书”名义,编辑出版了40余种测验著述。正是因为智力测验的广泛开展,从而为施行教育提供了科学依据。

其三,强化推进科学教育。1922年7月,特邀美国“科学教育教学法”专家推士(G. R. Twiss)来华,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上发表专题演讲,强调科学教育的重要。此后,他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“特约研究员”。两年内,他的足迹遍布中国10省、24市、248所学校,发表专题演讲276场次;所到之处,科学教育均得以改善。在陶行知的主持下,中华教育改进社又与清华学校和洛氏驻华医社合作,在清华学校举办了“科学教员暑期研究会”,集合16省的120余位科学教师共同研习,为时4周,由推士负指导之责。此为“科学教育思潮”构成的重要因子。

其四,推进与国际教育接轨。1923年2月,中华教育改进社接获参加“世界教育联合会”(也称“万国教育会议”)的邀请函,邀请组团出席该会的成立大会。陶行知于是积极筹备,推定与会者名单,组成中国教育代表团;准备了“中国之教育报告”17种(包括自编的《中国教育之统计》),并预拟了若干提案。是年6月28日~7月6日,中国